

〔加〕伊莎贝尔·柯鲁克 〔英〕大卫·柯鲁克 著

十里店

——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北京出版社

十 里 店

——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加〕伊莎贝尔·柯鲁克 著
〔英〕大 卫·柯鲁克

安 强 高 建 译
燕 凌 校

北 京 出 版 社

TEN MILE INN

Mass Movement in

a Chienese Village

by Isabel and David Crook

据美国纽约众神书店 1979 年版本译出

十 里 店

——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加〕伊莎贝尔·柯鲁克 著
〔英〕大卫·柯鲁克

安 强 高 建 译

燕 凌 校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41,000 字

1982 年 6 月第 1 版 198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500

书号: 10071·380 定价: 1.10 元

致 谢

首先感谢对我们推心置腹的十里店老乡，以及不仅是我们的译员，也是我们的研究伙伴的工作队和边区干部。我们还要向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方便的边区政府和党委领导人、阅读了我们的原稿并提供宝贵意见的中国和西方友人，以及为我们翻译文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致以谢意。最后，我们还要对经常鼓励我们，以及为我们润饰原稿时表现了编辑技巧和充沛精力的玛琍·巴尼特，杰弗里·福德以及詹姆斯·佩克表示衷心感谢。没有这些集体努力，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

序

柯鲁克教授夫妇的记实著作《十里店》，生动地记录了1948年2月到5月间在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所在地武安县九区一个村子里的土地改革复查、整党和民主运动的全过程。读着这本书，它把我们带回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带回到人民民主革命的火热年代。

柯鲁克夫妇是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老朋友、好同志。他们在中国人民艰苦斗争的年代，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解放区，深入群众，亲临现场，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采访和调查研究，以他们流畅的文笔，为我们一个有代表性的村庄的群众运动作了真实的记录。我们自己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他们替我们做了。他们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事社会调查的科学方法，他们的为人和工作作风，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同甘苦，共患难”，这不只是指在解放区那一段生活；在我们建国以后三十多年间，依然如此。现在，他们以古稀之年，仍在为办好北京外国语学院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趁《十里店》中译本出版的时机，我愿代表原晋冀鲁豫解放区，特别是十里店的群众、党员和干部，也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柯鲁克教授夫妇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感谢！

薄一波

1981年10月

张磐石同志给安岗同志的信^①

安岗同志：上周我挤时间把北京出版社送来的《十里店》中译本印厂校样匆匆看了一遍。觉得把它用中文译过来出版，还是有必要的。

作者以他们的亲身经历的“一个村庄的革命”为题，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土地改革的一个重要阶段——即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在十里店的发展过程，历史地、真实地记载下来。全书二十三章，几乎每章都可以单独地成为一个美好的故事。其中人物（不论是工作队员或农民群众）的活动，包括他们怎么说，怎么做以及其心理状态、立场、个性，作者都用他们自己的活动的事实和语言，使之栩栩如生地活跃在纸上。在重要事件的结尾，作者往往仍用纪事的手法，而不是泛泛空谈，轻轻几笔，却能点出事情的本质，有的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是难能可贵的。

最近期间，我重读了赵树理同志写的反映当时晋冀鲁豫边区土改复查的小说《邪不压正》，对照起来看，《十里店》作者的纪事是比较准确的。因为老赵同志是用小说体裁，写出了当时运动发展的一个横断面，而《十里店》则是以报道的手法，写出

① 张磐石同志和安岗同志都是当时工作团的负责人。

使人喜读的报告文学。当然老赵同志对农村和土改，是很熟悉的；而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十里店》作者们，初到解放区不久，就能把对他们说来十分陌生的，不容易为西方资产阶级偏见所淆惑的人所愿理解的土地改革这类“奇事”记载下来，而这个记载又能做到和老赵同志差不多一样地把它如实反映出来，应该说是极不容易的。这只能说是作者们同情中国革命和他们进步的唯物主义思想以及坚持深入实践的丰硕果实。中国人有“旁观者清”的古语，我想《十里店》的作者对于中国的土改运动，也是“旁观者清”！可以这样说：这本《十里店》不仅正确地向西方人民宣传了我国土地改革运动的真相，对我们人民也是一本宝贵的革命史料（关于土改的史料我国出版的不少，《十里店》应该算是其中的一本好的），也是教育我们后代的好教材。正象作者为中译本写的《前言》中说的那样，它将有助于“促进实事求是的报道态度，刻苦而科学的调查研究风气”。而这些正是现在我国农村建党整党和党如何领导农民为社会主义为现代化奋斗所必需的。因此，它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仍有重要的意义。

译者安强、高建同志，他们都很年轻，当然并不可能参加过土改，但他们译得很好，称得上是准确，流畅。尤其是在使用群众语言和赋予革命感情方面，有很好的表现，青年一代在这方面比我们强。我想说的一点是，校正的工作也很关重要，没有参加过的人，特别是没有那时的笔记查对，好多人名、地名和重要事件是译不准确，甚至是译不出来的。听说何燕凌同志校阅过，他是当时的参加者，从书中看，他这个校阅可能下功夫不小。因此我建议把校阅者的名字也能列上。

此外，我还想到两点：

一是成立贫农团和农会后以及工作队撤走后，仍应明确要由共产党领导，不可模糊为“贫雇农打天下”等等。二是应明确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农民即使是贫雇农，作为党员，也不能只是为人民服务，甚至也不能只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而模糊自己是组织中的一员，更不能模糊党的性质。在当时我们的工作中，也不是不知道，或不理解这些原则，而是在群众发动起来后，积极引导和促使群众觉悟的工作做得不够，因此不可避免地迁就了由我们工作中以某些左的观点所导致的群众的左的情绪，这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作者的反映是真实的，后来是由党来纠正了自己这方面的缺点。

还有一点：这个工作团是在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下，由我负责的中央局宣传部，人民日报社，以及晋冀鲁豫文联，新华书店等单位组成的。范围是当时武安县九区的农村。人民日报社人多（当时报社以三分之一的人坚持工作，轮流参加工作队，兼任采访记者），便以报社为主组成几个工作队，参加者有外国朋友，也有延安来的老同志如杨之华同志等。这次参加土改工作，对于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和文学艺术界深入实际，体验生活，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太行山出现的又一个范例，收获也很大。特别是对人民日报社一批骨干后来的成长和发展，是起了相当好的作用的，值得纪念！这在《十里店》一书中，虽然只有部分反映，但我想它对所有当时在武安县九区参加土改复查的同志均会有亲切之感，而且对于在各个解放区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也会引起亲切的回忆与联想。

张 磐 石

1981年10月27日

作者为中译本写的前言

将《十里店》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使我们惊喜交集。一方面，我们感到是一种极大的荣耀；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惶恐不安，因为，这将把两个西方人（一个加拿大人和一个英国人）所写的关于中国土地改革的书，给对这场运动了解得深刻得多的中国人民来评价。我们不禁想起一句英国的谚语来，“不要教你的祖母怎样煎鸡蛋”。我们是绝不敢“班门弄斧”的。我们只希望中国读者能指出其中的缺点和遗误之处。当然，如果某些内容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或者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话，那就更好了。

写这本书，花了很长时间。如果没有许许多多中国同志孜孜不倦的帮助，要完成它是完全不可能的。这里，首先要感谢的是十里店的群众，他们是那样百问不厌地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另外，还有许多干部，从基层组织的同志到薄一波同志（他当时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杨秀峰同志（他当时是边区政府主席）、张磐石同志（他当时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长，主管武安九区的土改整党工作），以及其他许多同志，无法在此一一列出。然而，我们必须提到的是由安岗同志（他当时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率领的主要由人民日报记者组成的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们。还有外事训练班（现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外事训练班，当时设在靠近石家庄的一个小村子里）的教员和学

生们，他们帮助我们翻译了大量的文件。在翻译工作中，我们要特别感谢李棣华同志（他当时是薄一波同志的英文秘书），他参加了农民和工作队召开的许多会议。他有时蹲在露天的石台上，有时坐在农民家里的小凳子上，把农民们太行口音很重的、我们根本听不懂的土话，流畅地译成地道的英语。

如果说，在有了所有这些帮助后，这本书还费了很长时间才写成的话，那么，出版它所花的时间就更长了。在中国刚刚解放的时候，七十年代出现在西方的那股“中国热”还不存在。这样一部书，即使是在最好的出版时机，也根本不会成为畅销书。这种风险，使最初的出版商望而却步。但是，他们同意出版以《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为题的关于十里店 1937 年至 1947 年（我们到达那年）这段历史的书。以后，又出版了我们写的《阳邑公社的第一年》（十里店后来成为该公社的一个大队）这本书。但是，我们一直认为，只有《十里店》这本书，才是最有价值的。

多年来，这部书在英、美出版商手中辗转传阅，但无法出版。一直到引起了在纽约的众神书店工作的詹姆斯·佩克的注意后，才有了出头之日。他给了我们很大鼓励，但也提醒我们，尽管该书的手稿在过去几十年间曾经反复修改和重写，但要出版，仍需作进一步的修改，主要是要作大量的删节。我们当时正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学工作，于是，就冒昧地向他提出：“能否由你来作修改呢？”他与他的同事，特别是玛琍·巴尼特，欣然同意了。今天这部书能同读者见面，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们的努力。

这一漫长的过程是很有意义的。1947年当我们从英国第一次进入中国解放区时，我们充满了幻想。初次接触这个“英勇的新世界”，真使我们为之目眩。经过三十多年后，我们才体会

到了一些在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在1949年6月30日听广播毛泽东同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中说到“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象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时，我们发笑了，当时我们认为：“他很谦逊，他是一位诗人。这不过是写文章的辞令。”现在，我们对他当时的见解才开始有所理解：尽管土地改革、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更复杂的斗争仍在前面。

当把这本书呈献在中国人民面前时，我们看到，在经历了大搏斗的剧痛后，中国开始了新的长征。她面临着重建自己的经济，抵制道德败坏，恢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及恢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所有优良传统，特别是在土改斗争中所执行的群众路线的传统的更加伟大的斗争。今天，我们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乐观情绪，这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乐观的态度比起1947年来，更为清醒、冷静并具有坚实的基础。因为它是以实事求是为根据的，而不是建立在曾经一度深深地禁锢了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盲目信仰和夸夸其谈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这本书能对促进实事求是的报道态度，刻苦而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风气（没有这种态度社会进步是不可能的）做出一丁点微小的贡献的话，我们的努力，以及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中外朋友们的努力，也就算得到最好的回报了。

1980年11月

于北京

作者介绍

大卫·柯鲁克生于伦敦，在英国和美国受过大学教育。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加入国际纵队英国旅作战。1938年首次来华教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远东英国皇家空军服役，尔后，在伦敦大学的东方、非洲研究学院学习中文。

伊莎贝尔·柯鲁克生长于中国的成都。她是一位加拿大传教士的女儿。她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获得心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她回到中国的西部和西藏地区进行了大量的人类学考察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英国一家兵工厂工作，尔后，加入了加拿大军队。

1947年，柯鲁克夫妇来到中国解放区，研究土地改革运动。1949年，他们作为外事训练班的工作人员进入北京。这一外事训练班后来发展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柯鲁克夫妇也就在那里工作至今。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国际友人柯鲁克教授夫妇于1948年春作为观察员采访河北十里店村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的记实性作品。作者翔实而生动地描绘了工作队深入发动农民的过程，反映了落实党的土地政策后，翻身农民的欢乐情绪，报道了消除左的割封建尾巴运动的消极影响的过程，以及整党后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崭新面貌……

目 录

作者为中译本写的前言	1
1. 到达十里店	1
2. 工作队来到十里店	16
3. 发动尚未翻身的农民	25
4. 党员的自我批评	37
5. 串连贫雇农	45
6. 寨上划阶级	56
7. 选举贫农团发起人	71
8. 宗派主义	84
9. 寨上评议党员	89
10. 群众评议党员	95
11. 组织贫农团	108
12. 建立贫农团	118
13. 党和群众	130
14. 建立农会	141
15. 制服老虎	149
16. 傅高林的问题	165
17. 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些思想问题	169

18. 村人民代表大会和新的村政府	175
19. 第二次划阶级	187
20. 斗争对象	192
21. 丈量瘦地和肥地	197
22. 摘帽子	210
23. 模范家庭妇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222
24. 查窟窿找补丁	233
25. 找更多的填窟窿的土	247
26. 填窟窿	255
27. 既往不咎	266
28. 民主领导的一些问题	273
29. 党支部面向未来	281
30. 分配果实	293
31. 全村的总结	312
32. 工作队回村检查工作	323
33. 展望未来	328

到达十里店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战的中期，我们乘坐一条驳船，沿大运河顺流而下，穿过无人区，进入解放区。踏上华北辽阔的土地，一个新世界就展现在我们面前，在那里，一亿四千万人民正在同蒋介石进行着最后决战。这一年是1947年，是蒋家王朝二十年腐朽反动的统治行将复灭的转折点。封建势力在中国，即使在最小的村庄，也处于崩溃之中了。

我们很快就发现，为了表达这一革命的社会的思想和状况，解放区的人民创造了不少新词。其中，几乎没有比“翻身”这个词更能有力地表达革命过程的实质了。

从字面上讲，“翻身”就是“躺着翻过身来”。其意思是说，自己站起来，获取应有的权利，享受应得的东西。在个人与社会的这场变革中，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改革。共产党人着手改变中国旧的传统土地关系之日，也就是开始改造整个中国社会之时。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砸碎无所不在的地主阶级统治的枷锁，意味着第一次获得牲口和房屋。这是一场激发农民破除久已养成的卑怯心理和改变附庸地位的斗争，奋起反抗长期压迫他们的人的斗争。

中国人说的“解剖麻雀”，就是对某一具体事物作细致全面的调查研究，借以找出对同类事物起支配作用的一般规

律。我们也本着这一方针，对十里店这个中国村庄进行了调查研究。虽然这里有许多独特的东西，但对于了解整个解放区内无数村庄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来说，它仍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缩影。

1947年11月，我们到达十里店。这个村庄与另外一些村庄组成了一个解放区的首府。这一解放区称为晋冀鲁豫边区，包括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个毗邻省份的广大边境地区，面积为八万平方英里，人口约三千万。十里店就在北京西南约275哩，上海西北约600哩的地方。它位于该地区的主要贸易、交通运输线上。这条运输线把十里店与它东边二十哩的武安县城联在一起，并且通向邯郸城——京汉铁路上的一个车站。

十里店在洛河之滨。在村东，沿着一年干涸九个月的河床，有一条古老的土路。山坡随着河谷变窄而陡峭起来。人们花费很大力气在山坡上造起了梯田。一个个山头久经风雨侵蚀，光秃秃的象个“和尚头”。

再远一点的地方，与其说是一个村庄，不如说是两个村庄。在河谷里的是主要村子，通常叫“街”；从这里向东北顺着山坡往上走，是“寨”。鹅卵石路一直铺到大石头寨门。山坡的下半截被削成了断壁，寨门的石房的后背正好倚在上面。这寨子曾是地主用以统治下面村子里的农民的城堡。

坐着骡车，通过别致的南城门，我们进入了十里店。考究的拱门上面写着粗大醒目的白字：“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大救星”。这是一首填上新歌词的流行民歌里的一句歌词。有的标语则是痛斥蒋介石的。在另一堵墙上有一块黑板报，用粉笔抄出当天的新闻。这些新闻是从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抄下来